

一個大學校長的自白（9）

劉道玉

第四章 “黑炮手” 劫後餘生

大約9月中旬，結束了在北京的學習參觀，我又回到了闊別了兩年多的母校，受到了學校領導和親友們的歡迎，看到了初生10個月的兒子毛毛。他是我在蘇聯學習期間，於1962年11月3日初生的。給他取名“維寧”，意指維護列寧主義路線，是我留學蘇聯和反對蘇聯現代修正主義的一個見證。20世紀的60年代，在中華大地上發生了一場“文化大革命”。“革”實質上也是亂。他們“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凡是“當權派”、“學術權威”和傳統文化，都在打倒和掃除之列。這場“文化大革命”折騰了十年之久，文化教育科學事業遭到了摧殘，國民經濟已乎滑到了崩潰的邊緣，給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帶來了災難性的後果。

在這場“文化大革命”中，我首先是革命左派，後來被斥之為“保皇派”，最後被打成“走資派”、“蘇修特務”、“百萬雄師”的黑高參，炮打中央“文革”的“黑炮手”，歷經磨難，劫後餘生。

一、發奮著書立說

從蘇聯回到學校後，我繼續擔任有機氟化學科研組的組長，決心同時進行科研語寫書兩項任務，拿出像樣的成果來。

1964年春從學校傳出消息說，學校有意派我到英國留學，似乎有意要彌補我在蘇聯輟學受到的損失。但是最後選定的卻是外語系和物理系的兩位元優秀青年教師。後來有人分析說，那時學校領導分為兩派，他們都把我做為爭取的對象，希望我成為他們手上用於制勝的一張“政治牌”。

這年的秋天，我被晉升為化學系的講師。在教授成堆的今日來看來，這室不足掛齒的，但那時教授極少，講師也不多，在困難時期，講師還是享受營養品特供的高級知識分子呢！

當我回國後，我的導師曾昭掄先生正在主編《元素有機化學》叢書。這是一套大型的參考書，全書分六個分冊，第一分冊《通論》由曾先生親自撰寫，其他五冊分別是：《有機硼化學》《有機矽化學》《有機氟化學》《有機磷化學》和《金屬有機化學》，分別由他的五名助理編寫。因為我是從事有機氟化學研究的，在蘇聯也是學習有機氟化學的，所以曾先生就把《有機氟化學》一書的編寫任務就交給了我。

從1964年元旦開始，我就在編寫《有機氟化學》和科研兩條戰線上拼鬥，在時間分配上，白天作實驗，晚上和星期天寫書。無論是在大學讀書時，或是在蘇聯留學期間，已經養成一種習慣：一個人如果能同時做兩件事，那就不要只做一件事。同樣的，如果一件事一個人可以做的話，那就絕對不要兩個人去做，這就是我信奉的“有效工作”原則。

寫作是一件十分艱苦的腦力勞動，既需要具有對浩如煙海的文獻的駕禦能力，又要有嚴密的邏輯思維和歸納能力。雖然寫作對我還是第一次，但是在大學時編寫“疑難問題匯編”和在蘇聯採用的備課式備考的學習方法，使我受到了鍛鍊，為我寫書奠定了一定基礎，因此寫作起來並不感到吃力。

至1965年6月底，歷時一年半的時間，《有機氟化學》一書終於定稿了，一塊石頭總算落下了地。該書共23章，25餘萬字，引用中外文獻兩千篇，為寫作收及文限卡片兩千多張，翻譯英俄文獻資料10萬多字。這的確是一項巨大

的文字工程，它是 540 多個挑燈夜戰的記錄，是汗水澆灌的一分果實。為此我患了神經衰弱症，不得不住進醫院治療。

《有機氟化學》叢書由科學出版社出版。1965 年 7 月初，我把《有機氟化學》書稿送到出版社，由他們審定出版，後來我被告知，該書是委託上海有機化學研究所黃耀曾先生審查的，年底已通過。經過編輯家公，於 1966，該書也就停止出版了。事隔 15 年後，科學出版社又找出了我的書稿，仍然希望我修改出版，因為同類的書在國內還是空白。雖然我也有心要使夙願得償，但由於原稿部分失落，有機氟化學十多年又有了飛速的發展，在加上我擔付了繁重的領導工作，經過幾次嚐試，終因不從心而告吹，使我抱憾終身。

在科學研究方面 這時我的研究方像徹重於基礎研究方面，既符合高等學校研究工作的特點，也是我個人的學術興趣所在。我的研究題目是“氟代丙酮與亞磷酸三乙酯的反應機理的研究”，經過大量實驗，證明瞭在這一反應過程中，由於含氟原子數目的不同，反應機理可以朝兩個方向進行，既可以發生阿爾布卓夫重排，也可以發生派爾扣重排。這是一個新的發現，填補了文獻中在這一反應研究上的空白。從本質上說，科學研究就是探知未來，就是創新，也可以說是立“說”。當然，我的這個發現只是一項具體的研究，談不上是建立甚麼心的學說，只是擴展了前人的工作而已。

二、暴風雨的前兆

如果說 1966 年《五一六通知》標志著“文化大革命”作為群眾性的政治運動已經開始，那麼 1963 年以後的兩年多的時間裡，就是“文化大革命”爆發的前夜，從理論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為它做好了準備。

高等學校歷來是社會階級鬥爭的“晴雨錶”，它既不能脫離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同時它又借助於輿論陣地影響社會上的階級鬥爭。從 1964 年起，大學校園裡的政治氣氛變得越來越濃烈了。甚麼“突出政治”、“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等口號喋喋不休掛在嘴上，

134 在此同時，在教師與青年學生中，大張旗鼓地批判“資產個人主義”、“白專道”、“業務掛帥”、“理論至上”等等，一時間，政治氣息令人窒息，人人搞得暈頭轉向，個個謹小慎微。

當時，社會主義與帝國主義正處在冷戰時間，冷戰並不意味著平靜，爭鬥的對象轉向了另一場沒有煙硝的戰爭。這正如當時美國國務卿杜勒斯所說：「放棄武力並不是意味著維持現狀，而是意味著和平演變。」為了反修防變，特別是粉粹帝國主義在我國青年一代人中搞和平演變的癡心夢想，高教部推廣了北京某高校的經驗，在大學生中配備專職政治輔導員，一百個學生配一名，以嚴格加強對學生的思想教育與管理，培養和造就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階班人。

根據毛主席的指示，當時大學裡的文科師生，被派往農村這個“社會工廠”，參加農村的“四清”運動，接受階級鬥爭這門“主課”的學習，不僅如此，有些學生惟恐落後了，任意停課沖擊教學計劃，還把理科師生派到農村參加“四清”運動，在服從階級鬥爭需要的大前提下，化學系應屆畢業生 180 多人和我們一批教師，被送到湖北省隨縣參加為期四個多月的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叫“四清”運動）。

甚麼叫“四清”運動？為什麼要搞“四清”運動？我們這些搞自然科學的教師，並不十分清楚，因此在我們出發前，在校內先集訓學習半個月。學習的內容有：《關於目前農村工作中依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即“前十條”）《關於農村社會主義運動中依些具體的決定（草案）》（即“後十條”）和《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即“二十三條”）。在學習的過程中，省委負責同志和“四清”工作試點單位的負責人，還給我們作了報告和介紹了經驗。通過學習我們認識到：“四清”運動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是打擊和粉粹資本主義勢力倡狂進攻的社會主義革命鬥爭。“四清”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運動內容是清政治、清經濟、

清組織、清思想，在政策上一方面說基層組之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另一方面又指出要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農村群眾和農村幹部，要依靠基層組織和基層幹部，以及正確對待地主，富農子女等。

我們化學系參加“四清”運動的地點是湖北省隨縣，我和五年級畢業班的學生分配到這個縣的殷店區和草店區。這兩個區位於隨縣東北部山區，交通十分不便，農業生產落後，農民生活十分困難。我作為這個年級的總負責人，擔任了這兩區的“四清”工作團的副團長，這無疑增加了我的工作負擔。與其他工作團比較，我們不利的條件是地區偏遠，交通不便，農民生活困苦，但我們有利的條件是，畢業班學生年齡大一些，好管一些，工作能力相對強一些。特別是這個年級調幹生中黨員多，他們是我的得力助手，大量工作放手讓他們去做，使得我所管轄的兩個區的“四清”工作進展得還是順利的。

對我們師生來說，我們到農村參加“四清”運動有兩重任務：一方面在當地“四清”工作團領導下，承擔部分“四清”任務，即查清“四不清”幹部的問題；另一方面，又要接近貧下中農，接受他們的“再教育”，改照自己的世界觀。用那時流行的一句話說：“前者是革別人的命，後者是革自己的命”。“四清”工作隊內有嚴格的紀律，要求與農民實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不得搞特殊，白天我們基本上與公社社員一起勞動，晚上參加運動。我們廣大師生都能從嚴要求自己，時時警惕自己，不能因“惡小而為之”滑向“四不清”的泥坑裡。

儘管1965年秋已在糾正由於貫徹“後十條”的“左”傾錯誤，但是在實際的工作中，仍然還是存再混淆兩類矛盾的做法。例如，我所在的那兩個區，基層幹部中有兩個問題比較普遍，一是男女作風問題，二是種“自留地”的行為，有些基層幹部就僅僅因此被作為“四不清”幹部，進行清查和批判。也有些少數幹部在解放前當過一般的土匪，而這種情況在落後的山區也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他們也因此做為政

治歷史問題而當作“四不清”幹部受到清查。對此，我在“四清”工作團的幹部會義上，曾就一些個案提出過意見，希望要正確地掌握政策，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要冤枉了一些有缺點的好人。

當時，我在思想上感到很困惑，一方面從上面聽到的是：農村存在激烈的階級鬥爭，甚至存在反革命的兩面政權，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掌握在我們手裡；另一方面，我看到的是農村一派落後的景象，與我過去看到的解放前的農村並無二樣，農業生產落後，農民生活很苦。於是我的思想上產生一系列的疑問：中國農村主要矛盾究竟是甚麼，是搞階級鬥爭還是發展生產力？中國農村到底處於甚麼階段，是處於小農經濟的封建主義社會，或是已走上社會主義道路，或是復辟資本主義道路？我問農村的出路在哪？甚麼時候才能像蘇聯那樣實現農業機械化？這些問題我怎麼也沒有想明白，直至“四清”運動結束，我仍舊帶著疑問回到學校，陷於長期的思索之中。

回到學校之後，同樣嗅到一股濃烈的階級鬥爭氣味，自1958年後，校內始終存在兩派，鬥爭的焦點是：到底是維護1958年教育革路線，保護革命積極分子（“革命派”）？還是否定1958年的教育革命成果，打擊革命的積



鋪天蓋地大字報

極分子（“糾偏派”）？1962年“糾偏派”借整風之機，暫時把“革命派”打下去了。現在“革命派”大有借“四清”運動之勢，對“糾偏派”進行一次戰略反攻。

全國形勢如“山雨欲來”，武漢大學就好比一隻隨時都會引爆的“火藥庫”。

三、李達“三家村”

1966年4月，我突然被任命為武漢大學副教務長，時年32歲，職稱是講師，這在當時的重點大學中是絕無僅有的，這一舉措是與當時的革命形勢有關，意在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興許我是沾了“反修戰士”的光。

然而，我並不領這個情，不僅沒有任何喜悅之情，反而背上了思想包袱。因為我一心一意想當一名科學家，這是我從小立下的志向，為此我度過了“十年寒窗”的歲月，而這一任命意味著我要放棄自己的追求。因此當黨委書記莊果向我宣佈這一結果時，我極力陳述，表示不能接受任命。雖然當時強調“突出政治”，服從“黨的絕對領導”，但我自認還有點“政治資本”可以討價還價，一直堅持不到教務處去上班。所以我這個副教務長是一天班也沒上，一天權也沒當的“當權派”。

5月初，武漢大學舉辦了一個“教育革命展覽會”內容是肯定1958年教育大革命的成果，揭發某些人砍掉校辦工廠，反對理論聯繫實際，反對半工半讀，打擊1958年教育革命積極分子的錯誤等等，這個展覽會的目地十分清楚，就是要揭開學校的“階級鬥爭的蓋子”。實際上，這意味著“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已拉開了，武漢大學又成了推行極左路線的試點。

在中國，五月歷來有“紅五月”之稱。當年的五月也不例外。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毛澤東主持制定的《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五一六”通知）。通知要求全黨“高舉無產階級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革社會的所謂‘學述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文化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通知”公佈以後，舉國上下同仇敵愾，憤怒地揭發批判《海瑞罷官》、《燕山夜話》和北京市委“三家村”，文化大革命已成燎原之勢，銳不可當。

5月25日，在北京大學大飯店的東牆上，赫然貼出了一份大字報，標題是：“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做了甚麼？”署名是哲學系的7名幹部與教師，領頭的是哲學系總書記聶元梓，大字報貼出後，有人支持，也有人表示反對，但是過了一兩天，出現了依編導的形勢全是反駁聶元梓的大字報。然而康生等人將他受意寫成的這張大字報的印件送到當時還在中南海的毛澤東手中。6月1日，他在上面做了批示：“此文可由新華社全文廣播，在全國各報刊發表，十分重要，北京大學這個反動堡壘從此可以開始打破。”當天，新華社全文廣播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不僅以“第一篇馬列主義大字報”的美名傳遍了全國城鄉，而且掀起了全國高等學揪出“三家村”的高潮。

6月2日，南京大學揪出了匡亞明反黨“三家村”

6月3日，《人民日報》、《湖北日報》同時點名批判武漢大學李達校長“三家村”。事情發生得如此突然，形勢變化之快讓人不可思議，為甚麼黨的創始人之一的李達，一夜之間便成了反黨份子？為什麼撰寫《矛盾論解說》、《實踐論解說》的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一下子便成了反毛澤東思想的敵人？我和大家一樣，感到一片茫然。

所謂李達“三家村”是由三個人組成的，為首的當然是李達校長，二號人物是原武漢大學黨委書記朱邵天，他是武漢大學1962整風運動後調來的，1965年初調至廣州中南局科委任副主任；第三號人物是副校長何定華，他是延安時期老革命，曾留學日本，主管學校的後勤工作。“三家村”被點名批判後，經中南局批准，朱紹天同志從廣州被遞解回武漢大學，交待自己的問題，接受群眾的批判。

6月3日在武漢大學小操場，召開了首場批判李達“三家村”罪行大會，不僅本校師生而且附近學校和機關的代表也參加了，有萬餘人，氣氛十分緊張。據說經過請示，在批鬥會上可以讓李達站在臺上（實際上他未到會），旁邊放一把籐椅，他如果體力不支，可允許他坐下來，這是那時所謂

的“文明批判”。此刻，學校派人到湖南李達老家，通過零陵縣委，找來了幾個自稱是受李達剝削的農民，拿著鋤頭在大會上控訴李達的“罪行”。在批判大會上，除了給他們三人定了反黨“三家村”黑幫罪名以外，還給李達校長加上了“地主分子”“叛徒”、“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三頂帽子。

批判大會以後，校內的大字報、大標語普天蓋地，學生已經不上課了，學校的一切工作也都轉到“革命”這個中心上來了。從6月3日點名批判李達“三家村”開始，由湖北省委和武漢市委佈置和動員，每天數萬人步行到武漢大學，手中揮舞著“打倒“三家村””、“打倒李達”、“打倒朱紹天”、、“打倒何定華”的小旗幟。他們絡繹不絕地圍繞著李達、何定華的住宅，高呼口號，把她們揪到馬路上罰站、低頭、下跪，一直持續了半個多月，人數高達150多萬人，幾乎是傾城而出！

可憐的老校長，他雖然革命了一輩子，但卻沒有見過如此的“革命”，沒有料到竟革命到了自己的頭上來了。他雖然是馬列主義大師，滿腹經綸，但解釋不了這群眾運動為甚麼是“天然合理”的。他病了，病得不輕，以“李三”的化名送進醫院。沒有不漏風的牆，在那個“革命”的年代，人人都要站穩立場，愛憎分明，有誰敢對他始施以人道的治療呢？幾天之後，1966年6月24日李達校長溘然含冤而逝，這離點名批判他還不到一百天。就在他去世之前，7月18日，為反常規地將他這個黨的創始人之一的老黨員開除了黨籍。

形勢還在激烈的變化，珞珈山的狂風越刮越烈，東湖裡又掀起陣陣惡浪。一個以李達“三家村”劃線的大揭發、大批判運動正在全校如火如荼地展開。於是全校開始掀鬥各式各樣大大小小的“三家村”。凡是李達等三人的學生、部下、受到他們提拔和重用的人，統統被打成了李達“三家村”的骨幹分子和黑爪牙。據統計，當時受李達“三家村”株連而被批鬥的有兩百多人，被編成兩個加強連送到武昌縣東升公社監督勞動改造。

面對著這殘酷和嚴峻的形勢，我陷入了徬徨，我到底以甚麼態度參加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呢？我是不是還要執拗著拒不接受副教務長的任命呢？正在我徘徊之際，此時已是校“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組長是省委文教書記兼任的）的莊果書記再度找我談話，他關切地說：“道玉同志，現在形勢已經十分明朗了，這場‘文化大革命’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每個黨員都要旗幟鮮明地投入運動，以實際行動保衛毛主席，保衛黨中央你現在不能躡在象牙塔中，抱著你的專業不放，要無條件地服從組織決定，接受省委對你副教育長的任命。”最後他加重語氣說：“道玉同志，我不希望看到你在這個問題上犯錯誤呀！”我沒再說甚麼，意味著我默認了。

形勢已不允許我作任何選擇了，我極不情願地以副教務長的身份，參加了校文革教育革命組，並擔任了組長。就這樣，我被動地被拖進了“文化大革命”的漩渦中，陷入了武漢大學的兩派鬥爭。這既是當時的形勢所迫，也是我唯一選擇，一方面確實怕犯政治錯誤，另一方面，我對毛主席確有很深的感情，也想到一份革命的動力作用，以實際行動捍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四、神秘的使命

“五一六”通知公佈以後，特別是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論，給正在興起的運動火上加油，使“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越燒越旺，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了黨和國家的領導部門及其領導人。首先是陳伯達率領工作組於5月31日到人民日報社奪權，6月4日又公佈了改組中共北京市委的決定，接著國家各部委和許多學校、機關、工廠的負責人被加以各種罪名遭到揭發、批判和鬥爭，出現了學校停課、工廠停產和黨政機關癱瘓的嚴重混亂場面。

6月中旬，由北京傳來消息說，高教副部長劉仰嶠同志被高教部的革命群眾掀鬥了，出了他的很多大字報，內容涉

及到他在武漢大學工作期的一些問題。接著又有消息說，在北京函授學院任教務長的羅鴻運同志也被掀鬥了。為甚麼他們的掀鬥會引起武漢大學的革命左派們的特別關注呢？這是因為劉仰嶠同志於1958年到1960年，任武漢大學黨委第一書記兼常務副校長，他不僅是武漢大學1958那場革命的領導者和決策者，而且在以後的兩派鬥爭中是支持“革命派”的。羅鴻運同志是解放前武漢大學的地下黨員，1959年時他是武漢大學黨委常委兼化學系總支書，他領導的化學系是1958年教育革命的先進典型。在1962年的整風糾偏中，他被排擠出了武漢大學，調到了北京函授學校任教教務長從這個介紹可以看得出，他們兩人與武漢大學的“革命左派”不僅有著個人之間的情誼，而且在1958年的教育大革命中有著同甘共苦的經歷，在以後的“路線鬥爭”中有著共同的關點，也可以說有著一致的利益。

正是出於上面的原因，武漢大學文革核心領導小組的領導人，準備利用他們當時有利的條件，出面保護他們兩人。經她們研究策劃，決定派一個人去北京實地瞭解他們兩人的情況，向她們傳達有關領導同志對他們所做的指示，同時在京再找有關領導，希望關心他們兩人的情況。派誰去完成這個神秘的任務呢？我萬萬沒有想到這個任務落在我的頭上。我猜測原因有三：一是我有“反修戰士”的這塊招牌，它可以起到別人起不到的作用；二是我有時間，當時我並沒有承擔任何與清查“三家村”有關的任務；三是1962年整風糾偏時我不在國內，未受到李達校長他們關點的影響，1958年教育革命中雖然不十分突出，但也算得上是一個積極份子，在她們看來，我還是一個可靠的人。

那麼我對執行這種神秘的使命抱甚麼態度呢？當時我是樂意去做這件事的，這是由於我的思想認識決定的。首先，我對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擁護的，但我反對懷疑一切，不贊成極端民主，肆意沖擊黨政機關和揪鬥革命幹部。當然包括像劉仰嶠和羅鴻運這種好同志。其次我對他們兩人的印象很好，劉仰嶠同志再任武漢大學黨委地一書記

期間，我是一位剛剛畢業的普通教師，與他沒有單獨接觸過，他對我甚至毫無印像。他理論水準較高、作報告、寫文章都是親自動手，從不要秘書代勞，他是當時公認的武漢大學自解放以來領導水準最高的一位黨委書記。羅鴻運同志市化學系黨知書記，是我的頂頭上司，他性情急躁，工作作風有些主觀，但是他的事業心很強，工作幹勁很大，也有領導水準。他來化學系之前，這個系連系主任都選不出來，是全校有名的“老牛拉破車”的系。但是在他的領導下，經全系師生員工的共同努力，化學系教學和科研水準迅速提升，一躍成為全校的先進系。像這樣的兩位有政績的好幹部為甚麼要打倒呢？我想不通，覺得是有人要把水攪混，做一個共產黨員要敢於堅辭持真理，要敢於挺身而出，我下決心要保他們。

就這樣，6月下旬我帶著“尚方寶劍”，登上了去北京的38次列車。所謂“尚方寶劍”，就是當時湖北省委第一書記、中南局第一書記、中央文革領導小組副組長王重同同志對劉仰嶠的表態談話，當然不是我直接聽到的，是學校負責人像我傳達的。同時他們還交給我一封湖北省省長張體學同置給時任中宣部部長張平化同志的親筆信，讓我到北京後去向他匯報仰嶠同志的情況，因為當實的體制是把教育劃歸宣傳部領導的。

到北京後，我住進了高教部石附瑪大街招待所，開始了我的機密活動。第二天上午，我到高教部看了大字報，果然看到了貼有仰嶠同志不少的大字報，有所謂的政治問題，也有他在武大、湖北政委、河南省委和高教部工作上的問題。看完大字報後，我來到院內仰嶠同志居住的石板樓附近，意欲到他家看望他。但我發現他的樓前有兩個人渡來渡去，我懷疑他們是監視仰嶠同志，我不敢造次，佯裝看大字報的人，轉身淹沒在看大字報的人流之中。

回到招待所後，我心裡一直盤算怎麼與仰嶠同志聯繫上，幸好那時他的電話尚未切斷，那時的技術也尚未達到安裝竊聽器的水準，於是我決定通過電話聯繫，很顯然，照待


所的話事不能用的，正好郵電大樓招待所只有兩站路，我立即步行到郵電大樓。我本意識想約仰嶠夫仁范兆常同志出來會面，但我們互不認識，於是我想好了見面時的標誌與暗語，我把這一切在電話中告訴了范兆常同志。

我們在電話裡約定：見面時每人手裡拿著一把黑色摺紙扇。大約晚上七點，一個手拿黑色摺紙扇的婦女走進了郵電大樓大廳，我從座椅站起來，打開摺紙扇示意，她走到我面前問道：“同志你是從武漢來的吧，那裏的氣溫怎麼樣？”我說：“今年夏天來得早，武漢北京都一樣，溫度都很高。”暗號對上了，我們走出大廳，沿著長安大街北側向東走，不一會我們來到了中山公園，找到一個僻靜處坐下。我首先詢問了仰嶠同志的身體情況，她說：“還好，只是血壓有點高。”我接過話茬兒說：“聽說仰嶠同志遇到了點麻煩，武大的幹部和教師很是關心，特派我來看望他，今天上午我已了妳們家石板樓附近，我懷疑有人在你們家門口放哨，我未敢進去。”她說：“那是造反派的人，是監視我們的，已經一個多星期了，你千萬不能去。”我的懷疑被證實了，幸虧多了一個心眼，我接著說：“為仰嶠同志的事，學校領導找了任重同志，他也很關心，明切的表示‘仰嶠同志是久經考驗的好同志，是堅持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無論是在武大、湖北省委或河南省委，工作大方向是正確的，成績是主要的，這是任何人也抹殺不了的。請告訴仰嶠同志，這次運動來得猛，剛開始群眾可能有點過火，也可能有人渾水摸魚，沒有甚麼可怕的，到時我會說話的’。”“這一段話，我是照著筆記本的記錄念給她聽的。”最後我說：“請轉告仰嶠同志，武大革命派永遠相信他，永遠崇拜他，永遠支持他，請務必保重！”范兆常連聲說：“謝謝同志了，請轉達對任重同志的謝意。”談話完了以後，我請她先走一步，我在中山公園溜達了一會，然後才走出中山公園，漫步在西長安大街上，我為第一次“地下活動”的成功而高興。

趁熱打鐵，我又回到郵電大樓，如法泡製與羅鴻孕同志通了電話，我們約定次日上午九時見面，地點是位於天安

144 門廣場東南角的北京市老郵電局。是日他託病到醫院看病出來與我會面。我們沿著東交民巷邊走邊談，我向他轉達了學校依些老朋友和化學系一些教師堆他的同情和關心，介紹了學校《文化大革命》的形勢，重復地傳達任重同志對仰嶠同志的談話內容，還講了見到范兆常同志的情況。聽後，他長嘆了一口氣對我說：“你來得太及時了，文化大革命真把我搞蒙了，我在北京沒有熟人談心，悶得發慌。聽了任重同志對仰嶠的表態，我心裡踏實了，仰嶠同志最瞭解我，他沒有事，我也就放心了。”最後我說：“老羅同志，你一定要有信心，究竟自己是甚麼人自己最清楚，你性情急躁，千萬不能與群眾‘頂牛’好漢不吃眼前虧呀。”他說：“是呀，是呀，我一定要注意。”

第三天，我帶著張體學的親筆信，來到中宣不求見新任命的部長張平化同志。接待我的是辦公室的一位姓何的女同志，她是武漢人，所已對我格外熱情。沒多久她帶我到了評化同志的辦公室。雖然是初次見面，由於體學同志的引薦信，同時評化同志過去先後擔任過武漢市市長和湖北省委書記，因此見到家鄉來的人顯得客氣。當他看完體學童致的信後頗為動情的對我說：“是呀，仰嶠同志，不，還包括我們一大批老幹部在內，是老幹部遇到了新問題呀。過去搞運動都是由上而下的，是有領導、有組織有步驟進行的，有甚麼精神也是由上而下，先黨內後黨外進行傳達學習，而這次‘文化大革命’完全不同，甚麼是都是一桿子到底，往往是群眾知道了而領導還不知道，黨外知道了而黨員還不知道，真是跟不上形勢哪！不過，實事求是黨的一貫原則，布裏怎麼樣，最後做結論還必須依賴事實。因此請你轉告仰嶠同志，要相信黨，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該說的堅持不說，也不能違新的做檢討。我就不便去看他了，代我向他問好，請他多多保重！”



在接下來的幾天內，我又分別與范兆常與羅鴻運秘密見了幾次面，向他們傳達了平化同志的談話內容，介紹了學校“文革”的進展。范兆常同志對我說：“聽了任重同志的談話，仰嶠同志的心情好多了，請回去轉告武大的同志們，感謝大家的關心，也請大家相信，仰嶠做為一個老同志，他一定經受住這次運動的考驗。”

在與羅鴻運同志的接觸中，我發現他心事重重，似有難言之隱。於是我說：“老羅同志，你有甚麼為難的事請告訴我，只要允許，我一定設法幫助你。”他說“我個人已無所謂，只是放心不下小姚他們母子，我好久沒有回去了，也沒有給她寫信，也不知她再天津的情況怎樣，真是令人不安哪！”我說：“那就這樣吧！我就到天津一趟把有關精神和你的情況當面告訴她，然後再把你家裏的情況反饋給你。”他說：“那就太謝謝你了！”我說：“老羅同志，你就別客氣了，你是我的老領導，姚惠莉是我的學生，為你們傳遞資訊也是應該的，相互報個平安嘛！”

我按著老羅給我的地址，乘車直達位於天津電源研究所內姚惠莉的家：當她見到我時驚奇地問：“劉老師你怎麼來了？”我說：“我是受老羅之託，專程來看你們他放心不下呀！”她問：“他是不是出事了，難怪很久沒有收到他的信了，真把人急死了！”“是呀！正是怕妳擔心我才來的。”接著我向她介紹了老羅的近況，傳達了有關領導對他的關心，概述了北京“文革”的簡況。小姚哭了，這是思念之淚，是感激之淚。我臨走時又囑咐她說：“小姚，這次運動來得非常兇猛，今後不管發生任何狀況，妳都要堅信老羅是好同志，妳要堅強一些，堅持到最後就是勝利。

應該說，我這一次執行“神秘任務”順利完成任務，而且遵守“地下工作”嚴格記律，除了單線聯繫我的頂頭上司之外，甚至連我的家人也不知道我那次活動的內容。

但是1967年8月，出自我的一位要好同學妻子的一份揭發我的大字報，差一點要了我的命，此是後話。

（未完待續）